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
主流意识形态

20 SHJI ZHONGGUO WENXUAN
JIAZHIGUAN YANJIU CONGSHU

宋剑华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20 SHIJI ZHONGGUO WENXUAN
JIAZHIGUAN YANJIU CONGSHU

百年文学与 主流意识形态

宋剑华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 / 宋剑华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百年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I. 百... II. 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096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

宋剑华 著

责任编辑: 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12.375 字数: 318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355-3803-7/G·3798

定 价: 21.7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文学家的赞赏与贬抑、肯定与否定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各要素中,形成文本的召唤结构,引导读者从审美活动中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作品中的体现尤其鲜明重要,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相对而言比较重视从人生意义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评判作品。不过,由于时代本身的限制,以往的文学批评在价值问题的分析方面有两点局限是明显存在的:一、从严格的学科领域分界来看,价值观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同一般性的人生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以前的文学批评习惯于将二者混同起来有时甚至将价值学说完全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价值观念作为伦理学说的特殊性;二、在文明社会中,价值观呈多元形态,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阶级意识形态的,也有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以前的文学批评对价值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方面,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价值体系则有所忽略。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位教授承

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 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各种价值观念的爬梳整理与分析剖解,突出价值观念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独特性关系,显示出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一方面,为文学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确立一个历史性的依据,让人们从理论与历史中认识到,在文学中价值可以被重估、被解构,但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驱逐;另一方面,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说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同其他各种价值体系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如何包容并且充分利用各种价值体系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多元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正是出于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问题之关注,当课题组成员前来联系这套丛书出版事宜时,我们欣然答应下来,并初步拟定人文主义、传统文化、宗教伦理、市民文化、后现代主义等价值体系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来告诉人们,如果文学的领地只允许一种价值体系的存在,文学就无可置疑地会变得单调、枯燥与板滞,同样,在多元格局的价值形态中,文学家如果不能明确自己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文学也就难以完成它的人类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我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在编辑体例上作出了统一的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与写作风格上,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给作者一个自由与充分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较好地实现我们的出版构想与目的,并热切期盼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2002 年 10 月



作者简介

宋剑华，男，1954年生，辽宁丹东人，文学博士，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文学的觉醒与选择》、《困惑与求索：论曹禺早期的话剧创作》、《胡适与中国文化转型》、《文化视角中的现代文学》、《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价值准则	(43)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全新 阐释	(44)
第二节 对立与统一：个体独立意识的历史重新 定位	(62)
第三节 抽象与具体：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展现 形式	(80)
第四节 反思与重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的现实 境遇	(96)
第二章 阶级斗争人生哲学的价值认同	(106)
第一节 功用与审美：百年文学价值追求的二元 对立	(107)
第二节 感性与理性：阶级斗争观念对于人性的 消隐	(127)

第三节	压迫与反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人生 体验·····	(145)
第四节	困惑与彷徨：现代意识觉醒之后的沉痛 反省·····	(162)
第三章	思想启蒙社会角色的历史互换·····	(174)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农民群体拯救世界的使命 承载·····	(175)
第二节	启蒙与自救：知识分子先锋意识的逐渐 丧失·····	(193)
第三节	清醒与茫然：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双重 困境·····	(211)
第四节	放逐与回归：知识分子复乐园后的变异 心态·····	(227)
第四章	理想主义浪漫情愫的价值追求·····	(245)
第一节	光荣与梦想：理想主义政治理性的浪漫 抒写·····	(246)
第二节	苦闷与亢奋：青春理想赋予人生的纯真 激情·····	(264)
第三节	主观与客观：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生 执著·····	(278)
第四节	存在与虚无：现实与历史对话中的艺术 解构·····	(297)
第五章	英雄主义完美意识的价值推崇·····	(311)
第一节	现实与理想：英雄传奇民间概念的现代 阐释·····	(312)
第二节	平凡与完美：传奇英雄思想行为的超凡 脱俗·····	(328)

第三节	生活与虚构：传奇英雄皈依政治的艺术建构.....	(344)
第四节	反思与解构：现代英雄主义理想的神话破灭.....	(366)
参考书目		(383)
后记		(385)

绪 论

所谓主流价值观,按照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导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主流价值观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全方位介入,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因为从上个世纪初叶起始,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文学现代性的价值追求,就始终是处在一种极度痛苦和极度困惑的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中国新文学的全面启动是在西

方现代意识的影响下而展开的,无论它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去接受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精神洗礼;另一方面,受实际落后国情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严重制约,它又极力想要摆脱对于西方的绝对依赖而寻求民族文学现代性价值观的独立品格。这种两难境地的双重夹击,迫使国人急切地想要建立起一套既符合本民族现代文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又能够尽快实现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实用价值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兴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以集体主义的理性精神、阶级斗争的实用哲学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入主中国现代文坛。它不仅以其强烈的思想感召力,立刻折服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并促使他们迅速加盟;而且更是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便基本上清除了其他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最终以无可辩驳的绝对权威性完成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思维结构的规范与整合。

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最基本、最清晰的运行轨迹。

—

全面探讨主流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之间的结盟关系,我个人认为应该以历史而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这需要我们首先必须去充分注意一个十分奇特的社会现象: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政治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文学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强烈欲望,几乎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道亮丽景观。尤其是在涉及文学观念大转换的三次文学变革运动(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基本上都是由一些政治思想

家和社会革命家率先在文学领域中发难，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符合他们自己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文学创作主张，进而去实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各自不同的思想影响。比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周扬、毛泽东等人，他们几乎都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可他们的确又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三次价值观念大转换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虽然都热衷于文学，但在文学与政治两者之间的历史抉择中，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都牺牲了对文学原有的那种亢奋的兴趣，最终归位于他们所追求的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社会解放事业。因此由他们所发动并领导的历次中国现代文学变革运动，以当代文学的理性思维来加以审慎观察，自然也就算不上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运动，其真正的意图只不过是要借助于文学的躯壳，来演绎他们的思想信仰和政治主张。正是由于政治革命家与社会活动家对于现代文学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才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与20世纪中国政治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荣辱与共、主次分明的时代共进关系：政治是文学的灵魂，而文学则是政治的工具；文学的使命并非是要创造自身的审美价值，而是要承载社会政治革命的思想理念。“从梁启超把文学革新推崇为实现政治目的直接的根本的途径，到毛泽东把文学视为革命的重要一翼……几乎一个世纪，就其主流而言，文学都是作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①从而牢固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政治之间的不解之缘，无疑是

^① 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第4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主流价值观大规模介入文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正面去加以高度重视：那就是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对民族现代意识的呼唤、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对国民个性意识的启蒙，一直到后来左翼红色文学运动阶级意识的觉醒，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是如何顺利地切换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的？这种自然转换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科学认识。

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荣辱与共、协调发展的同构联动关系，使得它们在五四前后那个刚刚走出了古典主义历史规范的特定年代里，只能选择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来作为自身具体实践的现实践参照物，并希望能像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期那样，以思想启蒙的软性浸透方式来开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只要我们稍加回顾一下“五四”前后中国文坛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社会呼声的热烈高涨，就不难发现中国作家无论是钟情于何种表现风格或何种表现形式，他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渴望却是惊人的一致，即：对于传统文化集体理性意识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于西方人的主体性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所以，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呼唤国魂开通民智”^①、“欲新一国之民”^②的宗旨，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③的追求，其客观反映出来的实际效果

① 《小说林之旨趣》，《中外小说林》第 1 期。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 年创刊号。

③ 《鲁迅全集》第 4 卷 第 5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和社会影响，思想政治方面的意义明显要大于文学自身方面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启动和新文学初期的繁荣，的确都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

但是，由于对思想文化启蒙长期性的认识不足，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与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在经历了两次短暂的时代辉煌之后，很快便沦为沉寂；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反抗叛逆的激昂呐喊，也随之转变成为了悲愤凄凉的痛苦呻吟。为什么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思想启蒙运动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便出现这种大起大落极不稳定的社会躁动现象呢？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的长达五百年时间之久的思想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急功近利文化传统的内在影响，错误地将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混为一谈，所以面对苦难深重黑暗依旧的中国社会现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他们很快便对自己所信仰的、以个性解放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与动摇。经历了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鲁迅，后来他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时，曾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真实地表述了自己当时那种非常沮丧的内心感受。他说：“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找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搞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的放下他们的箜篌了。”^① 对于鲁迅的这段话，研究者多有

^① 《鲁迅全集》第6卷 第244页。

引用且各有心解。但我个人却以为，鲁迅这段颇为凄凉的叙述话语中的“歌唱”，意思当然是指新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主义启蒙精神，而“听者”自然就是指那些愚昧落后不思醒悟的国民群体。当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取得原先主观预想的实际效果时，那么放下“筌篲”，也就暗示着新文学作家对其最初所选择的西方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的绝望和放弃。这绝不是刻意的曲解历史或夸大其词，五四新文学后期的创作实践，已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性。比如鲁迅的《彷徨》和《野草》、郭沫若的《星空》、闻一多的《死水》、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和《虹》、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中，男女主人公面对苦难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与焦虑，已不仅仅是新文学作家对于当时社会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一种艺术描述；而是新文学作家群体借助并通过自己笔下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他们本人灵魂深处的思想矛盾和情感磨难。诚如“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位巨人郭沫若在其狂热激情严重受挫后所哀鸣的那样：“我们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①从坚定地信仰西方人文主义启蒙精神到“失却了路标”，五四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思想理念的极不稳定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实际上已向社会发出了新文学价值观正面临着重新选择的明确信号。由于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一体化历史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所制约，随着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迅猛崛起与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全方位介入。

^①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

而这种全新价值观的及时介入，对当时正处于停滞状态并失去了前进方向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而言，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历史拯救行为。

我个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绝不是一种由于外界因素的强行介入所导致的历史偶发事件，而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其本身就客观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在要求。如果我们从时间概念的角度来做一分析，1924 年至 1926 年期间，中国新文学运动出现了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社会现象，非常值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深刻思考：当时那些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其逐步放弃了先前的思想信仰并开始进行痛苦的自我反省过程中，几乎都对新文学崇高的思想启蒙使命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可以说这是一种与“五四”人文精神相矛盾的思想裂变现象）。与此同时，在急功近利传统文化观念的支配之下，他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知态度，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非理性的情感偏执——即：从“文学决定论”走向了“文学无用论”。比如，一向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仍然坚定地厮守着人文主义启蒙精神的文学巨人鲁迅，此时他却主动放弃了对文学创作的原有激情（事实已经证明，1926 年以后，鲁迅基本上脱离了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其主要精力也转向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愤然发力向社会大声疾呼道：“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①又如，先前一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① 《鲁迅全集》第 3 卷 第 417、第 423 页。

并一再声明将艺术视为是生命惟一的郭沫若，此时也逃离了象牙之塔的艺术宫殿（无独有偶，郭沫若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终止了他对缪斯的青睐，目的明确地加入到了现实社会中的政治革命实践。他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也只是基于政治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而非是一种真正自觉的艺术追求），并公开改变了先前对于文学艺术的神圣信念。他一反以往那种鄙视文学艺术功利主义的强硬态度，同鲁迅一样认为：“要解决人类的痛苦，那不是姑息的手段可以成功的”，使用文学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实际效率，最终只能“用武力来从事解决。”^①众所周知，鲁迅与郭沫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到了1926年前后，他们对于文学功用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深度思考，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应该说，他们对于文学艺术自主意识的全然放弃，是因为他们明确感觉到了文学艺术缺乏改造社会现实的直接效应；而他们对于政治革命和武力崇拜的自觉认同，则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五四人文主义启蒙精神的潜在否定。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几乎五四新文学的所有重要作家都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这一新生社会政治力量的出现与存在，他们在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具体实例的感召下，纷纷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解和向往。不仅鲁迅与郭沫若反复地在他们的文章里阐述了见解相同的上述观念，茅盾1925年也对“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发出了质疑，他强调：“在我们这时代，中产阶级快要走完了他们的历史

^① 郭沫若：《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郭沫若佚文集》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